

中山大学“善政与良治”博士文库

黄迎虹 著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A Case Study on Mahatma Gandhi's Satyagraha Fasting

感化型政治： 以圣雄甘地绝食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山大学“善政与良治”博士文库

The Politics of Conversion:
A Case Study on Mahatma Gandhi's Satyagraha Fasting

感化型政治： 以圣雄甘地绝食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黄迎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化型政治:以圣雄甘地绝食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黄迎虹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中山大学“善政与良治”博士文库)
ISBN 978-7-208-10730-4

I. ①感… II. ①黄… III. ①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458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金 婕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中山大学“善政与良治”博士文库 ·
感化型政治:以圣雄甘地绝食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黄迎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3 字数 299,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730-4/D·2080

定价 38.00 元

总 序

举凡公共事务之学,素以探究“政道”与“治道”为要。古老如善政理想,仍为常论常新之愿景;时兴如良治理念,已成愈辩愈深之议题。当今中国,既享改革开放硕果,亦受社会转型阵痛,谓善政、良治之学恰逢其时,当非妄言。

然学术乃代代相承之业,端赖老凤雏凤合鸣其声。后学才俊之成长,系于作育之功,亦需荐进之力。近数年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各代学人,承续政治学科百年文脉,铸锻公共管理学科全面兴荣之势,于博士生培养着力尤甚。可堪道者,盖有四焉:夯实课程训练、深求研究方法、关注现实问题、完善培养制度。究其初衷,设若四法并举,为师者尽其心智,为学者敏慧勤勉,则人才频出之状,或可期也。

可慰人心者,天道酬勤。累积经年,学院博士毕业生之学位论文中,品质可观者众,部分佳作已各各付梓,呈于学林。学院乐见于此,遂念人梯之责,欲尽扶掖之意,与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共商设立专门委员会,遴选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合力推出并将持续推进“中山大学‘善政与良治’博士文库”。

各类“丛书”,已成丛林,此一“文库”,何功之有?促进知识增长、推动学术交流,是所信也;以善政与良治之学理,倡扶善政与良治之实践,亦所望焉。

是为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谨识

前 言

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总是在血雨腥风中蜿蜒前行。进步、正义、平等、自由等至上的理想背后,是杀戮、压制和战争。作为群体的人类,展现了自己幻梦般的想象、追求和崇高的同时,却一再陷入了暴虐的循环中。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其代价却经常是几代人、成千百万人的牺牲和无辜的相互残杀。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为了自我保全和社会正义,将暴力与杀戮作为最后拯救的武器。但是,作为群体的人类,却一再卷入战争、压迫,乃至濒临自我毁灭的边缘——当前的核武器已足以将人类毁灭无数次了。

以理性自称的人类,为何要依靠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暴力来强迫同类呢?以正义、进步、繁荣等美好价值为追求目标的行动,为何不得不采取丑恶的暴虐、杀戮和强力作为手段呢?这构成一种“目的—手段”的悖谬律。人们要问,在这些看似无奈的宿命论后面,是否隐藏新的变革可能?人类能不能最终将自己从战争、军备竞赛和相互碾轧中摆脱出来,实现真正的和平共享、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呢?

这是本书的终极关怀。

出于这种关怀,笔者回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圣雄甘地^①和他的非暴力抗争运动——这场运动成为现代非暴力抗争的源流,深刻影响了诸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等后来席卷全球的非暴力社会运动。

正如有的作家[阿恩·纳什(Arne Naess)]指出的,与以往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如佛陀、基督)不同的是,甘地并非只是简单强调非暴力的意义,而是相反,他试图发明一种新的冲突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尽量回避暴力,而仅仅采用非暴力的、同样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冲突。这种方法试图填补人类社会政治变革中“目的—手段”分裂和悖谬的巨大鸿沟,为和平实现社会政治变革提供新的可能。甘地把这种思想和行动,称为“坚持真”^②,以其毕生精力创造和发展“坚持真”的

① 全名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尊称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本书中“圣雄甘地”和“甘地”混合使用。

② 又称为萨蒂亚格雷哈(Satyagraha),来自于印度古吉特语,中英文形式为其音译。但也有其他译法,英文有:sticking to truth, the force of truth, civil disobedience,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nonviolent military resistance等;中文有:“坚持真”、“真的力量”、“非暴力反抗”等。本书以“坚持真”为主要的翻译,部分情况可能会结合一定的音译,采用“萨蒂亚格雷哈”一词。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问题及其概念化	1
二、当前甘地绝食研究状况	10
三、研究方法	17
四、研究框架	19
第二章 革命与改革:现代政治变革的两难抉择	21
一、革命:血泪挣扎的暴力变革	21
二、改革:反复回旋的渐进变革	30
三、未竟的探索:对其他社会变革方式的探讨	39
第三章 感化型政治: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	45
一、“坚持真”:甘地的一种突破尝试	45
二、感化型政治: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	64
三、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	76
第四章 绝食政治感化的逻辑可能	97
一、论一般绝食	97
二、政治感化:甘地对绝食理论的贡献	100
三、绝食感化的适用	105
四、感化型绝食的运作及其主要原则	114
五、绝食感化的动力机制及其理论可能	122
第五章 绝食政治感化的现实可能	128
一、甘地公共绝食的整体性分析	128



图表目录

图 1.1 各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图	9
图 1.2 本书逻辑结构图	19
图 1.3 章节结构图	20
图 2.1 政治变革逻辑完整方式图	39
图 3.1 “坚持真”哲学基础逻辑图	56
图 3.2 “坚持真”的主要评论归纳图	78
图 4.1 绝食运作过程图	114
图 4.2 “坚持真”绝食动力机制图	124
图 5.1 绝食感化性程度图	161
图 7.1 政治变革逻辑完整方式图	230
图 7.2 革命—改革博弈格局图	236
图 7.3 三种变革模式博弈格局图	236
图 7.4 革命出现后双方博弈格局图	238
图 7.5 感化型政治出现后的双方博弈格局图	239
图 7.6 三种社会政治变革模式关系图	240
 表 1.1 政治感化、政治强制、非暴力强制的对比表	 7
表 3.1 “坚持真”与消极抵抗区别表	66
表 3.2 三种政治变革方式对照表	73
表 4.1 “坚持真”绝食与其他“坚持真”抗争方式的对比表	122
表 5.1 甘地历次公共绝食表	130
表 5.2 甘地公共绝食的目标情况表	132
表 5.3 甘地公共绝食的反对对象情况表	135
表 5.4 甘地绝食方式分类表	136
表 5.5 甘地绝食功能分类表	138
表 5.6 甘地各次绝食功效对比表	150
表 5.7 绝食者主观非强迫性对比表	156

表 5.8	绝食反对对象强迫性对比表.....	157
表 5.9	绝食利益相关主体强迫性对比表.....	159
表 5.10	历次绝食非强迫性对比表	161
表 5.11	各次绝食感化程度对比表	162
表 6.1	甘地与安倍卡关于贱民解放路径的分歧表.....	189
表 7.1	感化型政治现实性的深层透视逻辑表.....	222
表 7.2	作为普遍模式的感化型政治基本要素表.....	231
表 7.3	印度独立运作中各方互动进程表.....	242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问题及其概念化

(一) 研究问题

革命与改革是当代社会政治变革最为主导的变革模式^①，但是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不足。如革命，代价高昂，牺牲惨烈，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会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对抗状态，而其后果也常常值得怀疑——许多革命产生的是更为集权、专制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常会处于停滞的状况。所以存在走出革命、告别革命的呼吁和行动。

改革是对革命的一种替代或调整。但是，改革也面临着执政者动力不足，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改革方向致使变革避重就轻，甚至停滞等难题。改革者必须承受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冲击而如履薄冰，一旦因应不慎，则可能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所以改革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

本书的探究来自于这样的思考——是否有别的道路可以尝试？这种道路，能否取代原有的两种主导变革模式，又或者它能否改变旧的变革博弈格局，导致新的变革竞争环境？总之，它对现代政治变革具有怎样的作用 and 意义？

为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印度，那里正在进行着一次人类前所未有的试验。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引导印度人民采取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寻求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甘地把这种运动称为“坚持真”，它也成为甘地式非暴力抗争方式的独特用语。这种“坚持真”式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既非改革，也非

① 当然外来征服也是另一种方式。但是对既定的政治体而言，它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是内部自主、可以主动争取的进程。

“坚持真”绝食作为案例,进行集中分析。之所以选取绝食,而非其他诸如非暴力不合作、文明不服从等大型社会运动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与研究者的旨趣有关之外,也与这些运动的两个特质有关:

第一,这些运动在实践中存在严重走形的现象,使我们难以轻易判断其感化的成败(可见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事实上,这些运动都是“甘地+国大党”式的。甘地将政治感化作为信条来奉行,而国大党人则视其为行动策略,这种结合使这些运动不再是纯粹甘地式的感化型政治了。

第二,对这些运动的系统研究是一个巨大工程。它涉及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牵涉到千丝万缕、方方面面的历史细节,在今天对其研究,只适合从局部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却难以以一种政治学的眼光俯瞰这些运动,轻易地判断其政治感化的成败。

而甘地的绝食理论和实践,恰好是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它是迷你型的感化型政治,也是甘地亲历亲为的感化型政治,又是政治感化的典型和最高峰,这三点,使我们能够透过绝食考察感化型政治的可能性问题,具有现实操作性和理论意义。^①

但是,研究者必须在这里再度强调:绝食并非感化型政治的唯一或最主要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甚至是感化型政治的非常手段,因为按照当事人(指甘地)的话说,绝食是最后的“坚持真”斗争方式,是当包括“坚持真”在内的所有法定或非暴力的其他抗争方式都失败后才能运用的方式。这种抗争方式,在感化型政治的创始人眼里,是具有多样的限制和条件要求,是不可轻用的斗争武器。因此,如果把感化型政治等同于绝食,显然曲解了感化型政治的多样存在方式和极大的应用前景。

我们选取绝食进行案例分析的目的,绝非要压缩和简化感化型政治的理念和现实形态。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探讨政治感化理念的现实可行性。我们试图通过对案例细致深入的描绘、分类、对比等分析,探讨政治感化的实现程度、政治感化理想对非暴力抗争的提升意义,进而发掘其独特的社会变革价值和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的问题可以归纳为:

本研究选取甘地感化型政治中,最为典型、最具感化特性、最为研究可行性的

① 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

绝食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政治感化以及整个感化型政治的可能性问题，进而彰显其对人类政治变革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当然，正如任何一个案例研究所难以克服的局限一般，我们也对自己的抱负有清醒的自觉。我们必须一再强调，我们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达成对感化型政治可能性的全面、最终的判断——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努力。但是，我们试图从绝食这个小窗口远眺整个政治感化的远景，以一种案例分析的方法，为未来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提供某种前期的储备。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研究并没有结束，它会是另一个研究的一个起点。

（二）概念的界定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本书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术语进行界定，以免因概念模糊而导致论证中出现歧义与误解。具体有：

1. 政治变革

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政治变革、社会政治变革两词。就本书主题而言，这两个词是被视为可以交替使用的术语。因为本书的研究主题在于，如何从政治上入手对社会采取有意识、自觉地变革。就变革对象而言，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相反，政治领域的变革是作为社会变革自觉的手段而存在，变革政治结构的目的在于重塑社会。所以，这种变革同时包含着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意义。它比那种更为狭隘的、仅仅在政治层面进行的政治变革，来得更为深刻、涵义更广。这种做法在政治社会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几个重要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对比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政治革命使命的定位等，都采取这种广泛意义的政治变革涵义。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革命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定位来讲，实质都采用这种广义的政治变革概念。^①

2. 政治变革模式

在本书中，方式、模式(或范式)是严格区分开的。就“方式”而言，它只是一种基于自然或现象的初步分类。“方式”的分类方法只是浮于表层，而不涉及事物的本性。比如说，从抗争的方式上看，“坚持真”与“消极抵抗”都是一种非暴力的抗

^① 可参见姜椿芳、梅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页；[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89页。

争方式,但是其精神和动力机制,其道德涵义和自我约束程度,却完全不同。而在本研究看来,“消极抵抗”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变革模式,其对社会变革的地位和作用,是无法与“坚持真”(或感化型政治)相提并论的。

而所谓的“模式”,在本书中的含义则与“范式”相近,它所指的是近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型”^①,是“在一段时间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②的贡献。差异仅仅在于,库恩的“范式”本意指的是自然科学范围的,并且具有范式更替取代的意义。“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社会科学中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③

具体而言,我们衡量政治变革模式的标准有:是否具有独立的变革指导精神和运作逻辑、是否可以独立承担社会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及是否具备多种多样的变革方法、手段,并且为广大的拥护者可以追随和采用。

就此而言,本书采取的分类标准,既采用人类通常的经验,又结合逻辑推演,按照变革的主体(当权者或社会民众)、变革的方式(暴力或非暴力),将其划分为四种政治变革方式,其中革命与改革是最主要的实践类型。^④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暴力变革模式,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由当权者自觉发动的、并不采用暴力的变革模式。而征服则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变革模式,但是因为它并非内部自觉地变革,而且也不具备广泛的采用可能,所以并非本书讨论的重点。最后,本书研究的感化型政治,则是一种非暴力的、自下而上的、依托于民众的社会变革模式。它以甘地的“坚持真”为原型,进而提炼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变革模式。

当然,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分类方法并非排外性的,诸

①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美]艾尔·巴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④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革命与改革是最为通行的分类方法。如安东尼·奥罗姆就持有这种观点;而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以革命、改革作为最为主要的现代化手段;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虽然以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道路、共产主义革命为三条道路,但是显然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属于革命路线,而德日的法西斯道路,都是采取“来自上层的革命”,事实上是一种改革道路。所以,他的观点只能强化革命与改革的二分法,而非对立。详细可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五、六章;[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如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特里·林恩·卡尔兰德(Terry Lynn Carland)和菲利普·C. 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以及更多民主化、现代化研究专家,都曾提出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①这些分类方法,根据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类标准而产生,与本书的分类法并不存在冲突或矛盾,而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本书对变革模式的分类、归纳和提炼,绝非一种整全意义的,而毋宁是一个对变革模式的补充性发掘。我们要说明的是在革命、改革之外存在的新的可以借鉴、援用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可以为我们变革社会政治提供新的启发。当然,这决不否认存在其他变革模式的可能,本书强调的恰是其中的一种努力。

3. 政治感化(Political Conversion)与政治强迫(Political Coercion)

在本书中,政治感化、政治强迫是关键性术语。在我们看来,感化意味着强制的不存在。而所谓的强制,对于甘地研究而言,一般的定义是“使用物质的或道德的力量(physical or moral force)来迫使他人做出违背其自身意愿的行动”^②。在本书的语境中,这种强迫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的强迫^③,另一种则是非暴力的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之所以要将非暴力的强迫另归一类,在于我们要防止对政治感化的误解,避免将所有的非暴力都理解为非强迫的错误做法。我们要强调的是,即便是非暴力的行为中,也可能构成强迫的事实。这一点在甘地的语境中受到高度的重视:所谓政治感化,不仅仅要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强迫,而且

① 如亨廷顿在《民主的第三波》就提到变革、置换、移转三种类型。卡尔和施密特就按照战略和行为者,划分为协定、强加、改革和革命四种类型。按照我们的分类来看,这些划分法并不构成对革命—改革二元分类的冲击,而只不过是这两种变革模式的混合或者更为细致的分类而已。如变革和置换,实质是改革与革命,而移转则属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其本性上更近于改革。而所谓的协定、强加都不过是改革的几种表现形态而已——因为这些变革最终都没有出现大型暴力来推翻政权的现象,而是以不同方式实现政权的变革而已。具体可见:[美]塞缪尔·P.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三章;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② 此定义来自鲍琳(Paullin)且先后为约翰·V. 邦杜兰特(John V. Bondurant)、阿恩·纳什(Arne Naess)等所采用。见 Arne Naess, *Gandhi and Group Conflic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p. 90; Joan V. Bondurant, *Conquest of Violence: The Gandhi Philosophy of Conflic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Theodore Paullin, *Introduction to Non-violence*, Philadelphia: the Pacifist Research Bureau, 1944, p. 6.

③ 本书认为政治强迫是以暴力为支撑和基础的,所以与非暴力的强迫对应,可参见第7页。

还要超越非暴力的强迫。只有同时避免这两种强制的出现,政治感化才能真正得到确立,感化型政治(“坚持真”)才能得到最终落实。

对这三个术语的区别,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入手:目的(包括事由和意图)、手段(方法和依据的力量)、结果、人性论基础来进行划分。具体可见表 1.1:

表 1.1 政治感化、政治强迫、非暴力强迫的对比表

		政治感化	政治强迫	非暴力的强迫
目的	事由	正当、公共(非私人)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意图	有避免造成强迫的意图和努力	视强迫为必要手段,不会主动去避免	没有主动避免的意图和努力
手段	方法	消极抵抗的方法,诸如非暴力不合作、文明不服从、绝食等	积极强迫的方法:政治权力、警察、监狱、军队等	消极抵抗的方法;环境可能的情况下,会采取暴力行动
	力量性质	心灵的力量(soul force);道德不舒服(moral discomfort);道德羞耻(moral embarrassment)	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权力,乃至于纯粹的暴力	精神性压力或威胁(psychology pressure or threat)
结果	对方态度	改变对方的观点或态度,自愿实现变革	对方没有改变观点或态度,被迫屈从行动者	对方没有改变观点或态度,被迫屈从行动者
人性论	—	正义感的普遍性;理性共享;人性本善,具有向善的可塑性;通过受苦和爱等纠恶促善	人是理性动物,面对各种威胁(threat)时,会屈服于外力的压迫	人是精神动物,即便不采取暴力,也会因为精神性的威胁,而屈服外力的压力

由表 1.1 可见:

在目的上:政治感化强调事由的正当性及公共性,既要求诉求是正当的,还要求其是非纯粹个体性的,必须有公共性、涉他性在其中;而政治强迫、非暴力强迫则没有这些限制,完全存在不合法、不正当的政治或非暴力的强迫,更不用说诉求的崇高性了。另一方面,在正确诉求得到满足的意图上,政治感化有明确的避免强迫的意识,它会尽其所能地避免强迫对手,尽可能地让对手以转变态度和观点的形式来推动变革;而这一点,无论政治或非暴力的强迫,都不会予以考虑。

在手段上:政治感化与非暴力强迫采取的方法在形式上是一致的,都采用诸如抵制、不合作、不服从等消极抵抗的办法,其差异仅仅在于精神层面。政治感化